



从巅峰到低谷

尼克松 1990 年回忆录

理查德·尼克松 著

从巅峰到低谷

尼克松 1990 年回忆录

方华文 马 进 方汉文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从巅峰到低谷

尼克松 著 方华文 马进 方汉文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西安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 11.75 印张 256 千字

1991 年 9 月第 1 版 199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7-224-01840-6/I·422

定价: 5.20 元

第一章

1

巅峰与低谷

1972年2月21日，北京

从北京机场到国宾馆是一段奇特的旅程。在任副总统和总统期间，我出访过梵蒂冈、克里姆林宫、东京的皇宫、凡尔赛以及威斯敏斯特，想不到现在又跑到了北京来。一位美国总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可是破天荒第一遭。1964年我在卡拉奇与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会晤时，他就建议我到中国来。那时他刚从北京归国。我问他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说：“是人，是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他们涌上街头，手中挥舞着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国旗。鼓掌声和欢呼声不绝于耳。”我坐的是中国政府的轿车，车窗被窗帘遮得严严实实。不过我还是找到了一条细缝，可以窥视外面的情景：街道上空荡荡的，只有一位哨兵孤零零地站在几百码开外的地方值勤。

机场上的欢迎仪式无可挑剔，完全符合外交礼仪，美中不足的是有些冰冷。周恩来的头上没戴帽子，穿着大衣站在凛冽的寒风之中。我和夫人走下舷梯时，他开始鼓掌。我们也报以掌声。在1959年出访莫斯科时，我们了解到这是共产党国家的传统习惯。我主动伸出手去和他握手。后来我才得知这一

举动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仪仗队队员个个身高体直，衣帽整齐，全是由周恩来亲自挑选出来的（这是我以后才得知的）。军乐队奏起了美国国歌。在访问其它国家时，我反复听到过这个曲子。其调子源于一首英国古老的饮酒歌，很难演奏，有些音阶甚至无法辨别。然而，中国人却把它演奏得无懈可击。

我对我们的东道主知之甚少。基辛格的眼头非常高，但他说周恩来和戴高乐是伯仲之间、不差上下，都是最杰出的外交活动家。

周恩来不愧是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三言两语便叫我悬着的心落了地。离开机场时，他说道：“您的握手来自于大洋彼岸，跨越了 25 个互无往来的年头。”他还告诉我，他是通过我撰写的《六次危机》了解我的。这倒让我感到意外。他说我的一生大起大落，但我从不气馁，能够摔倒了再爬起来。我在中国逗留期间，他把这一点重复了好几遍。譬如，有一次在飞机上，他特意针对我的经历指出：逆境是良师，坦途出庸材。受到一位长征路上过来的老战士的夸奖，我实感受宠若惊。

我们参观了长城、紫禁城以及其它古迹，概括地了解了这个具有 10 亿人口、4 千年文明史的大国。按柯曾阁下的话说：中国是所不颁发学位证书的大学。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宴令人终生难忘。军乐队演奏了《美丽的美国》等悦耳的歌曲。周恩来热情大方，用筷子为我们夹菜，然后和我一道向首席的 50 余位客人挨个敬酒。我们端的是一盎司的酒杯，内盛茅台——一种味浓的中国酒。周恩来说这种酒“包治百病”。

最值得记忆的是我和周恩来及毛泽东的会晤。我们后来才得知，毛泽东当时已患了中风，但他的思维仍然很敏捷，在

同僚及下属中仍极受尊敬。记得临行前，我在白宫设宴招待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时，他对我说了一番话。此时，他的话犹在耳：“您要见到的是一个伟人，不过是一个衰老的伟人。猜猜，毛泽东见您头一面会怎么想？他心里会嘀咕：哦，他比我年轻得多。他持有我们无法理解的命运观，认为自己在完成人生的最后一项行动。”

毛泽东和斯大林一样，也是个爱书如命的人。他的办公室里摆满了书，那可不是装门面用的，而是为了阅读。在交谈中，他说他也看过我的《六次危机》，并认为是本“不错的书”。他显示出了周恩来那样的政治家的风度，说道：“在您的最后一次选举中，我投了您一票。”我说：“主席说投了我一票，就是投票赞成两种邪恶势力中罪恶比较轻的一种。”他即刻做出了反应，直截了当地说：“我喜欢保守派……保守派执政，我就比较高兴。”我说：“至关紧要的是让人们知道，美国的保守派，至少就眼下而言，能够做激进派只在口头空谈，而无法兑现的事情。”

最充实、最激动人心的要算我和周恩来之间进行的长时间的谈判了。他能够准确无误地记下我的话，既不需要做笔记，也不需要助手的提醒。他不但掌握着中美方面的问题，对国际事务也了如指掌。我们详尽讨论了我们彼此之间的巨大分歧——我们支持南朝鲜，他们支持北朝鲜；我们和日本建立了军事安全联盟，他们则持反对态度；我们支持第三世界的非共产党政府，而他们却反对；他们要求我们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我们却拒绝接受他们的要求。

既然存在着这些无法解决的分歧，我们又是如何达成一致呢？美国有一位中国问题专家曾预料说，毛泽东向我提的第

一个问题一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应该怎样帮助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呢？”他的估计是错误的。我们的讨论持续了很长时间，但一直没有涉及经济问题。如今，共同的经济利益是使我们两国走到一起的重要原因。在1972年，它却未起到任何作用。

我们当时共同关心的是战略利益，是反对苏联控制亚州。中国和苏联都是共产国家，而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可是我们没对中国构成威胁，而苏联却对它虎视眈眈。在这一点上，国家的安全利益高于一切。

基辛格和周恩来为《上海公报》草拟了精彩的条文。我的访问结束时，《上海公报》公布于世。公报上没有以含混其辞、毫无意义的外交词令掩饰我们之间的分歧。在无法达成一致的问题上，双方各自申明了自己的立场。在令人头疼的台湾问题上，我们指出大陆政府和台湾政府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我们认为大陆和台湾的矛盾应该通过和平的途径解决。公报还指明，中国和美国反对任何国家在亚太地区寻求和建立霸权。正是为了这个问题，我们才有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接触。《上海公报》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至今我们双方仍在严格地遵守着公报上的协议。

拟订公报条文是件苦差事。当这件工作完成时，周恩来对我们所取得的成绩非常满意。他深有感触地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诗词：“无限风光在险峰。”我接口说，我们已攀到了山峰之上。

随后，他又吟出了《咏梅》，并解释说，这首诗的意思是讲梅花有自己的性格，并不和群芳争艳。他远见卓识地指出：“您是中美关系的奠基人，但您不一定会看到它结出硕果。当然，

我们欢迎您再来中国。”

2月27日，在告别宴会上，我祝酒时说：《上海公报》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以后的几年中架起一座桥梁，把相隔16000英里的中美两国联结在一起，化干戈为玉帛，弥补25年的敌对所造成的裂隙。我举起手中的酒杯说：“我在这儿逗留了一个星期，这个星期改变了整个世界。”

有人会认为我的话言过其实。不过我和周恩来都珍惜那个时刻，因为我们俩都在低谷里辗转过。我们知道自己已抵达巅峰，却不知道在4年之后我重返中国时，我已辞去总统职务，而 he 已死于癌症。戴高乐曾经说过：“胜利刚一展翅飞翔，就会把翅膀重新收拢。”

1974年8月9日，白宫

昨天夜里在白宫我没睡好觉。这是常有的事：做完讲演或参加过新闻记者招待会后我总是久久难以入睡。昨天傍晚，我向全国宣布了自己的辞职决定。直至凌晨两点钟，我才昏沉沉进入了梦乡。

醒来时我看了看表：才是凌晨4点钟。穿过西厅，我来到厨房想弄杯奶喝，不料看到服务员约翰尼·约翰逊正在那儿煮咖啡。

“约翰尼，怎么这样早就来了？”我问道。

“不早了，总统先生，都快6点啦，”他回答说。

原来是我的手表停了。用了3年，电池里的电都耗尽了。平时我的早饭非常简单，吃块面饼，喝杯桔子汁和牛奶就

算交了差。可今天我特意吩咐约翰尼为我煎牛排和煮荷包蛋。我冲了澡、刮过脸，然后来到了林肯起坐间。白宫里数这间房屋小，可我喜欢到这儿来。旁边就是林肯卧室，林肯曾在那儿办过公。当时，林肯的两位年轻秘书约翰·尼古拉和约翰·哈伊在起坐间里处理公务。我在心爱的椅子上坐下，把脚放到垫脚凳上。这把椅子还是1962年我过生日时帕特送给我作生日礼物的。那时我们住在加利福尼亚。后来我们移居纽约以及白宫，都随身带着它。写这本回忆录时，我坐的还是这把椅子。

我开始为最后的一次讲话准备发言稿。昨天晚上通过电视，我已向公众交了底。现在我必须好好想想，向我的几十位白宫工作人员说几句知心话。他们是些富于献身精神的好儿女，在兵荒马乱的越战期间以及步履维艰的水门事件岁月里表现出了无限的忠诚。

我的思想集中不起来，于是头向后仰，闭上了眼睛。这间屋子里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如潮水般涌进了我的脑海。

1971年6月2日，就是在这儿我接收到了那封邀请信。亨利·基辛格称其为二战结束以来一位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那天晚上已经快11点钟了，我刚参加了一次国宴，回来后正坐在这把椅子上看材料，亨利上气不接下气地冲了进来。看他那样子，八成是从西厢房一路跑来的。他递给我的是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转来的邀请我访问中国的信件。正如周恩来以后所言，发信人、传信人和收信人全是首脑。我和亨利在饭后一般不喝酒，可这次破了例，举杯痛饮一位朋友在圣诞节送给我和帕特的陈年老酒，庆祝这一历史事件。

当我收住遐想的缰绳，集中精力写告别讲话稿时，我的脑子里反复在想这样一个问题：我的命运怎么如此多变，从巅峰一下子跌入了低谷？

外边传来了小心翼翼的敲门声。艾尔·黑格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页纸。昨天我就把公务处理完了呀，包括签署对一笔超预算农业拨款的否决书。黑格吊着脸把那页纸递给我让我签名。原来这是一封写给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辞职书，上面只有一句话：“我特此向美国总统办公室提出辞职。”

1953年我第一次见到艾森豪威尔总统时，他正在椭圆办公室里签署信函和文件。他抬起头冲我眨了眨眼说：“真气人，迪克，我的名字怎么这样长！”谢天谢地，我的名字很短，所以为黑格的信签名时一挥而就。

黑格走后，我只剩下一个小时为告别讲话做准备了。昨天在内阁和国会的老朋友及支持者会面时，我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最后脱口说道：“但愿我没有令你们失望。”今天，我必须设法为我忠实的部下打打气。我知道自己的讲话不应涉及帕特·特丽西亚、朱莉、埃德·考克斯和戴维·艾森豪威尔，他们要和我一起站到讲坛上去。对我和他们全体，那都是一个痛苦的时刻。他们曾经凛然不屈，顶住了新闻界无情的轮番攻击。这种攻击开始于1972年的大选之后，除过在我就职时以及1973年2月越南的和平条约签订之时有过短暂的停顿，一直持续了20多个月。每天的报纸都对此津津乐道，每晚的电视新闻节目都对此大肆渲染。家里人一致反对我辞职。和我母亲一样沉静的特丽西亚直到最后还坚持己见，劝我不要辞职。两天前，我在林肯起坐间里草拟辞职讲演稿，一直干到凌晨两点钟。当我到卧室想眯一会儿时，在枕头上发现了朱莉的短

信：

亲爱的爸爸；

我爱您，并为您感到自豪。无论您干什么都会得到我的支持。

我请求您耐心等待一个星期或 10 天再做决定。您是力量的化身，希望您能经受住烈火的考验，再坚持坚持。

朱莉

您身后站着数百万人民。

如果有什么力量能够使我改变主意，那就非朱莉的短信莫属了。可当时的我筋疲力竭，无力再做重新考虑。这倒不是说我拱手称臣、甘愿认输，而是因为我清楚自己的辞职对国家有好处。两年的水门事件已经够了，国家再也经受不住这样的创伤了。它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总统月复一月、日复一日地接受参议院的审判。美国需要一个全力以赴的总统去应付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

我的家人知道辞职的决定不可更改时，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采取支持的态度。帕特以超人的精力指挥着把我们在白宫五年半中积累的东西打点成行装。她两天两夜都没有合眼了，不知她是怎么熬过来的。上讲坛的那工夫，她的心虽在怦怦地跳，但她无比自豪地昂首挺胸站在我身边。正应了我平时挂在口头的那句话——不管从内务还是外务而论，她都是我们家最精悍的一员。

最后，我决定向白宫工作人员摊牌了，把自己的底亮给他们。我回忆了在一次国宴之后听一群黑人音乐家演奏的情况。音乐团的领队对能邀请他们到白宫来献技感激涕零，他说：“总统先生，您要知道从瓦兹到白宫来，可谓一步登天呀。”我回答道：“从惠蒂尔到白宫，中间也有很远的路程。”

我谈到了我的父母，并念了罗斯福在他的第一个妻子去世时写下的催人泪下的悼词。悼词中这样写道：“她的脸庞和身躯仍是那样美丽，灵魂依然纯洁可爱。正当她刚成为孩子的母亲，正当生活刚刚开始，正当灿烂的前程刚在她脚下铺开之际，可怕、怪诞的命运死神夺去了她的生命。我最亲爱的人离开了人世，我的生活永远失去了光明。”这段悼词是罗斯福在20多岁时写的。他当时以为自己的生活永远失去了光明，但后来他奋斗不息，还是当上了美国总统。

我继续侃侃而谈：“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挫折，遭受一些失败，就觉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一切都完了。这是不对的。这些挫折和失败通常只是事情的开始。如果你一帆风顺，就成不了大气候。相反，假若你经受考验，与困难、失望和忧愁做斗争，就一定会有所做为。只有在低谷里挣扎过，才能够品尝到抵达巅峰时的甘甜。干什么事情都不能半途而废。应该鼓起勇气，持续不懈地努力。千万要记住，其他人也许会恨你，但不一定能战胜你。如果你也恨他们，那你就毁了自己，被他们所战胜。”

非难者们吹毛求疵，说我的这些讲话过于感情冲动。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那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时刻。

一切事务处理完后，我们向福特等辞行，踏上了到加利福尼亚老家的归途。我们错误地以为，我们终于可以过上平静、

安逸的日子了。

1974年8月9日，圣克利门蒂

8月9日的下午，当飞机在埃尔托罗海军机场上空盘旋时，我可以看到下边有数百辆汽车挤成团在向已经满得不能再满的停车场里涌。我觉得自己没有精力再发表讲话，但我向欢迎的人群表示了自己的谢意。我发誓说一定要为争取和平及自由的伟大事业在国内和国外继续奋斗，这是我自打参加1946年的议员竞选以来一直为之拼搏的目标。

当我们向直升飞机跟前走去时，我听到人群中有人高喊：“惠蒂尔仍然欢迎你，迪克。”我的思路又回到了1952年9月的一天。当时我住在波特兰的一家饭店里。美国正处于资金危机的水深火热之中，似乎所有的人都和我作对，要求我退出竞选，就连大多数共和党人也跟着起哄。在这危急关头，我的两位忘年之交汤姆·比尤利和约翰尼·赖利特意乘飞机赶到波特兰为我助威。一进我的房间，约翰尼就说：“惠蒂尔所有的人都和你站在一道，百分之百地支持你。”两天之后，我发表了一次电视讲话，扭转了全国的舆论导向。可这次我知道永远也不可能争取到舆论的支持了。

加文·赫伯特和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些学生把拉卡萨·波西费科府邸装饰得焕然一新、美不可言。我对加文说：“回到平静的家中，真令人感到惬意。”

然而，这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暂时平静。第二天，对我的攻击就又拉开了战幕。特别检察官利昂·贾沃斯基当时听到

艾尔·黑格说我打算辞去总统职务，感到非常高兴。他认为这于国于民都有利。黑格把他们的谈话告诉了我，断定特别检察官不会再为难我们。他只考虑到了贾沃斯基，却没有考虑到贾沃斯基手下的年轻干将。我的辞职远远不能满足那些人的欲望，他们非得把我置于死地而后快。埃德·考克斯提醒过我，劝我不要辞职。他和贾沃斯基的一些部属是哈佛法律学校的同窗，还有些和他一道在纽约的司法部同过事，所以他深谙那帮人的为人。他对我说：“那些人机敏和残酷。他们对你恨之入骨，任你到哪儿去他们都会紧追不舍，不断地让你吃苦头，叫你一生不得安宁。”果不其然，全让埃德说对了。那些人遵循的是 19 世纪俄国革命家谢尔盖·涅恰耶夫的行为准则：“单单处死敌人是不够的，必须让他先尝尝受辱的滋味。”

迫害和打击雨点般朝我身上落下。

我向最高法院、加利福尼亚律师界和纽约律师界递交辞呈时，前两者接受了我的辞呈，而纽约律师协会从中刁难，企图把我按开除处理。

这期间，有几十个人对我提出起诉，要求赔偿我任职期间政府给他们造成的损失。幸亏那些事情都与我无关，所以大多数人的起诉都被宣告无效。然而，在这一系列诉讼案中，我得请人辩护。

我所付的律师辩护费高得惊人。在我辞职后的 15 年中，为了对付这些人的起诉以及保护我那受到政府威胁的权利，我花掉了 180 余万美元。

我曾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收回我的文件和录音磁带（其中一些纯属私人物品），但遭到了拒绝。

一家专搜罗丑闻的杂志刊登了几封情书。他们声称那些

信是我写给西班牙的一个女伯爵的。那个女人我从未见过面，情书全是伪造的。可是，这件事从来没有人追查。

报纸和电视继续对我毫不留情地进行攻击。我成为电视杂谈中的笑柄和数百个报刊栏目的轰击对象。反尼克松的书籍一本接一本地问世。敌人的冷嘲热讽尚有情可原，可朋友的落井下石却令人无法忍受。

数个月来，新闻界处处寻觅我们的足迹，紧紧跟随着我们，接连不断地向我们施加压力。一位叫马诺罗·桑切斯的火爆性子西班牙人自豪地称他是我的仆人。他对记者的倒行逆施感到异常气愤，把他们叫作“巫士和秃鹫”，并认为记者群里的女人比男人还坏。

最令我感到悲伤的是我的朋友所遭受的磨难。贝贝·里波佐被控与黑手党、赌棍及毒品贩子有瓜葛。特别检察官的那些部属把他纠缠了一年多。他被检察官的人及欧文委员会提去过了 85 次堂。所有的指控都是捏造的，他唯一的罪过就是不幸当了我的朋友。他虽然最终澄清了事实，但请律师辩护却花去不少钱。

谨慎、老实的莫里斯·斯坦斯受到了罚款的处理。他曾 5 次无意中触犯选举法。他所犯的是些微不足道的小错误，与违犯规则停车等同。民主党的集资人也犯过同样的错误，却没有人追查他们的错误。

1975 年在电视上观看大学生足球比赛时，节目突然中断，播音员插进来开始公布约翰·米切尔以及我的另外几个高级助理的罪行。从电视上观看体育比赛是我的嗜好，可以使我得到慰藉，可现在就连这种享受也被剥夺了。

迄今为止，对我打击最大的是所谓的“宽恕”。我辞职的一

条重要原因是害怕损害美国总统的形象，避免让一名总统因尚未证实的非法活动站到被告席上。但我的敌人并未因此而罢手。戴着乌纱帽时，我虽然被水门事件搞得焦头烂额，但仍能决定自己的活动范围。那年夏天的苏联和中东之行，在外交上产生了深远的意义。然而现在丢掉了权杖，我就丧失了主动权和防卫能力。我的地位一落千丈，对我的指控之词不管是多么苍白无力和卑鄙凶险，我都难以辩得清。实际上，对我、我的家人及朋友的诋毁和谎言层出不穷。我的敌人不仅指责我犯了严重的错误，似乎还想证明我就是邪恶的化身。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圣克利门蒂的那个9月4日。我的律师杰克·米勒从华盛顿急匆匆赶来。他步入我的办公室，告诉我说福特总统打算签发一项“宽恕令”，结束这种无休止的内部纠纷。我必须做出决断——是否接受总统的宽恕。

我们就此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我对米勒说，我担心“宽恕令”会使福特在政治上受到伤害。他说从目前来看是这样的。不过他补充说，如果美国仍在水门事件的漩涡里打转，福特总统和政府里的其他人就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外的紧迫问题上。那样对福特总统的伤害更大。

米勒了解我窘迫的经济状况，于是特意指出，雇用律师的花费以及其它的辩护费会使我彻底破产。他还说，我的肉体、精神和感情都忍受了极大的痛苦，所以为了我自己以及我的家人，我应该接受宽恕。他劝导我说，过去的一年半中舆论界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我别指望能在华盛顿得到公正的裁判。

接受宽恕是继辞职之后，我在政治生涯中所做出的最痛苦的抉择。我当时所说的一段话可以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的

感情：

“我的错误在于行动不够果断和坚决，致使水门事件从政治丑闻演变成了全国性的悲剧，最后走上了法庭。

“我在水门事件上的失误给国家带来了灾难，破坏了总统的声誉。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我内心的遗憾和痛苦。平心而论，我热爱我的祖国，尊重总统的声誉，不愿让它们蒙垢。”

“宽恕令”是在9月8日发布的。接着，我们预料的事情果然发生了——福特在民意测验中名声扫地；我遭到了新闻界新一轮进攻。

我素来认为思想状况与身体的健康之间有着直接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宽恕令”颁发后，我的遭遇就证实了我的这种看法。我的静脉炎和血凝已有20年的病史，症状通常出现在腿上。6月的中东之行前，我的左腿开始浮肿。几天前就有发病的苗头，可我没在意，没有及时向医生报告。当我把情况告诉医生时，他并没有象以后报纸上所说的那样建议我取消中东之行。在热敷和冷敷的交替治疗下，腿上的肿算是消了。可是在中东各种各样的仪式上，我由于站立得时间太长，腿又开始火辣辣地疼了起来。7月份访问苏联，在参观明斯克的战争纪念碑时，我在石子路上走了差不多有一英里半，腿疼愈加剧烈，令人难以忍受。

回到华盛顿，疼痛感逐渐减退了。辞职前最后的几个星期，我忙得不可开交，把腿疼的事忘了个干净。而今“宽恕令”签发了没几天，我的腿上又出现了浮肿。我去向家庭医生约翰·朗格伦咨询，他建议我马上住院治疗。他说如果血块破裂，就会蔓延到肺部，造成生命危险。我立刻引起了注意，乖乖地住进了医院。